

定期收回
注意保存

各支下：

于连泽同志在1976年“四人邦”加紧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时候，积极参与起草的“六·三〇”大字报，是一张有严重政治错误内容的大字报，是推行“四人邦”反革命政治纲领的一个具体表现。他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揭批“四人邦”斗争开尸以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于连泽同志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的认识很差。经过支下和同志们的帮助，他对自己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的检查态度是好的，值得欢迎的。经党委同意，刑庭支下已经宣布对于连泽同志予以解脱。现将于连泽同志的检查发给你们，可以在党内外群众中传达。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委员会

1979年3月2日

我对错误的认识和检查（稿）

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与“四人帮”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实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实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是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华主席的报告明确指出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和它的严重性。这场斗争确实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生死大搏斗。就是在这样一场重大路线斗争中，我犯了严重错误。我的错误是在1976年6月30日与几个同志给江华院长贴出了一张所谓《江华院长追随邓小平大搞右倾翻案风的罪行必须声讨》的大字报。

现将写出这张大字报的过程和我对所犯错误的认识交代检查如下。

1975年秋，我从湖北干校回机关工作后，大约是在深秋时候，我从一个同志的笔记本上看到江院长七五年初来最高法院工作后的一些讲话记录，这些记录中包括有75年3月底江院长主持的一次支委学习会的全下发言记录。我看了这些记录后，根据我当时的思想状况，对江院长的讲话有看法。我的看法，曾和王永成、×××等同志片断地有所流露。到了1976年1、2月份（也即是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后），我又将这个同志的记录借来做了抄录，还看了

王永成同志有关记录江院长讲话的笔记本和×××同志记在办公纸上的有关江院长的讲话记录。记得是在76年3月初，将所看到的这些江院长讲话的记录进行歪理，写仪寄给了华主席。此仪是由我和王永成、张志刚同志三个人商议署名的，由我执笔。当时华主席代总理兼公安部长，管政法方面的的工作。仪的内容根据回忆主要是根据当时的思想认识，反映江院长偏听偏信个别人，主观想法没根据，不了解高法院运动情况，讲话是右倾翻案，目的是希望中央了解高法院的情况。

到了1976年4月初，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这时，我认为邓付主席的问题既已成为对抗性矛盾，江院长的讲话也就水涨船高。此后，和王永成同志、×××同志，有时两个人，有时三个人又对江院长的讲话又有所议论。最后商定给江院长贴大字报，并定下调子既然贴大字报，就要上走资派的纲，上翻案复辟的纲，并推我执笔先写出个初稿，再共同研究修改。大约是在5月下旬或6月初，我即着手起稿。所用的材料仍是上百提到的写仪时所歪理的江院长的讲话记录。因为主要是在业余时间或自学时间写，所以写稿的时间拖得比较长。开始写出的稿，形式是普通的大字报，打靶把江院长的讲话附在大字报后边公布。此稿交王永成同志、张志刚同志看后，由王永成同志告诉我，提议改成加按语的形式（即后来贴出的）。这样，我又重新改写的，稿写好后，由我们三个人共同修改定稿（以上两稿均已交给党支下），还由他们二人征得××同志同意。这样在7月1日晚我们四个人在办

公室分工抄成大字报于当晚贴出的。署名为“刑庭下分革命同志”，日期写的是1976年6月30日。

以上是就我记忆所及，有关这张大字报从酝酿到贴出的过程。

这张极端错误的大字报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大字报在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上，贯彻的是“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宣扬的是“四人帮”反动谬论。它是我接受“四人帮”的流毒，听任“四人帮”谬论，贯彻“四人帮”黑货的证明。

这里首先应该讲清，“四人帮”对邓付主席的诬陷迫害，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已经作出历史结论，邓付主席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地斗争，遭到“四人帮”的刻骨仇恨和打击陷害。我在这张大字报中也学着“四人帮”的腔调诬蔑邓付主席是什么“右倾翻案的总后台”，完全颠倒了路线是非。这就充分说明写这张大字报的立足点，是站在“四人帮”的立场，按着“四人帮”的调子，彼唱此和，贯彻的是“四人帮”的一套。

这张大字报对江院长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影射诬蔑江院长搞右倾翻案，是什么正在走的走资派，对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什么复辟狂，还乡团，反党等等。把“四人帮”幌子工厂的大幌子全下搬出来了。不仅如此，大字报还以令人不能容忍的语言，对江院长进行人身攻击。“四人帮”有名的反革命谬论是，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张大字报兜售的就是这套黑货。这就进一步暴露出我的立场，思想和

文风，以及我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符合“四人邦”反革命修正主义那一套。

由于我接受了“四人邦”黑货，因而在很多问题上被我颠倒了是非，混淆了敌我。大字报中把江院长对“四人邦”倒施逆行不满的讲话，诬为对运动的不满，甚至把江院长与“四人邦”作斗争的寓意深长的讲话，也以“四人邦”的反动观点乱上纲，乱扣帽子。被我在大字报中颠倒的是非问题，现在必须加以澄清，还其本来的面目。

比如，关于1974年1月25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问题。我没有参加这次大会，大概是在1月28日或29日在院里听的传达。粉碎“四人邦”后，从揭批“四人邦”的材料中知道，那次大会，是“四人邦”背着毛主席耍阴谋另搞一套，矛头是对着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同志的，是“四人邦”为他们的罪恶阴谋制造舆论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1974年2月25日批评“四人邦”指出：“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1975年7月14日江院长在谈到这次大会时讲到：“1月25，辛辛苦苦，放了几个屁，掉队又落伍。”显然江院长的讲话，是针对“四人邦”搞阴谋未得逞，受到毛主席严肃批评。江院长是以打油诗的形式奚落“四人邦”的。但是，在这张大字报中却诬说江院长的讲话是什么反动打油诗，是反对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是对中央的，还耸人听闻地说什么要向公安机关报案追查（实际没报什么案了）。这就完全颠倒了

是非，把对的诬为错的，把反“四人邦”的说成是所谓反对批林批孔，诬为“反动”。这正好说明我是站在“四人邦”的立场上看问题，是站在“四人邦”的立场上说话。

再如，关于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还是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邦”的罪行揭发后已经清楚，他们为了妄图打倒一大批有丰富经验的老干部，大耍阴谋，混淆“经验”和“经验主义”的区别，竟敢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大肆宣传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在他炮制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黑文中，公然欺骗舆论，说毛主席十多年来多次重复了“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起了极坏的反动宣传作用。毛主席在1975年4月23日批判了“四人邦”的谬论，严正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但是，“四人邦”竟然扣压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继续批所谓“经验主义”。对此，我当时并别不讳，盲目听信姚文元的黑文。江院长针对“四人邦”的阴谋，在1975年5月21日讲到：“上海万人大会批经验主义，我们主要敌人是修正主义嘛，把经验主义批得灰溜溜的，还不是你《人民日报》宣传的……。把局部经验上升为理论才是经验主义，否则，有经验就是经验主义，读点书就是教条主义，正象新疆说的，跟谁就是山头，跟谁就是贼船，到底怎么办？”江院长的话本是批驳“四人邦”大批经验主义阴谋的。然而，对江院长的这些寓意深长的讲话，大字报却胡加指责。大字报虽然回避了直接讲“修

正主义”“经验主义”这样理论性的问题，但抓住江院长说“还不是你《人民日报》宣传的”这句话来做文章，说什么：“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报纸，难道不能宣传党的路线吗？”这实际是说，既然人民日报宣传批经验主义，那就是对的，这是替“四人帮”说话。大字报还给江院长扣大帽子，胡说什么“你的山头、贼船之说，又是什么忌思，如果给代上一顶反党帽子，你说合适不合适”。从这里完全暴露出，我的思想和“四人帮”是多么合拍，我维护的是“四人帮”的谬论，反对的是江院长根据毛主席指示批驳“四人帮”的正确讲话。而且还气势汹汹地给江院长扣上所谓“反党”的帽子。我完全颠倒是非，颠倒了敌我，充当“四人帮”批所谓“经验主义”的应声虫。

再如，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大字报也向江院长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这里需要说清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是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选拔干部的根本标准。按照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老中专三结合的原则培养、选拔干部，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保证。毛主席还指出，老中专三结合要年要好的，“自然不能统统按年令，还要按能力。”“四人帮”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故意把年令绝对化，用以否定“五项条件”以便打击老干部，排斥中年干部，坑害青年干部，实际是搞他的反革命的“帮”结合。“四人帮”在年令上做文章，就是故意搅乱人们的思想，乱中实现他们的阴谋。我在这个问题上也中毒很深，用“四人帮”的观点，对江院长胡加指责，乱扣帽子。江院长针对“四人帮”的阴谋，于1975年8月30日一针见血地讲到：

“毛主席的接班人五条里那有年专这一条？”并讥讽地说：“一提接班人就是年专的好，有人说三十几岁的比四十几岁的好，二十几岁的比三十几岁的好，十几岁的比二十几岁的好，没生出来的，不是更好！”江院长的话，是反映了群众对“四人邦”不满情绪的。但是我在大字报中硬是断章取义罗织罪名，攻击江院长的讲话是什么“复辟狂对革命新生事物的仇视”等等。现在十分清楚，江院长的讲话，明明是针对于“四人邦”把年令问题绝对化的反革命阴谋的批驳和挖苦，是强调要完全、准确贯彻毛主席有关接班人问题的指示的。而我，却向江院长乱打“四人邦”的大棍，祸国殃民的“四人邦”才是梦寐以求在我国复辟的黑邦，我人鬼不辨，完全颠倒了敌我界限。

再如，有关“造队”、“造查五一六”的问题，党中央早有明确政策，搞错了的要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毛主席早就明确指示要防止扩大化。江院长来院以后，为了落实党的政策，多次讲到这方面的问题。大字报对江院长有关这方面的讲话也横加指责，乱扣帽子。江院长曾经讲到：“既然没有（516），不是，那就应亡布一风吹，不敢亡布怎么能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讲：“什么大方向，在林彪路线影响下搞五一六，没有，就搞错了，这怎么叫方向？”显然，江院长这些讲话的中心思想，是为了贯彻落实政策，消除某些实际存在的思想顾虑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也是受拥护的。可是，这张大字报却以“四人邦”的观点影射江院长的讲话是什么“先刮一风吹，然后再当标帜派，是复辟派的惯技”等，把落实毛主席政策的讲话，诬之为“复辟”。尤为严重的

是，大字报还把江院长针对运动中出现过的某些不讲政策，生逼硬压的作法所讲的话，加以歪曲攻击。如江院长讲到：“要总结经验教训，别人不同忌，态度不好，那么你斗别人，这标态度好！”“一说就要正确对待，没有歪他，如果歪他，看你能不能正确对待。”江院长这些针对具体问题的讲话，本是无可非议的，而大字报却以极为恶毒的语言，强加莫须有的罪状，说什么：“这是地边的还乡团口气，公开的反攻倒标”等等。语言的恶毒，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完全是站在“四人帮”的立场，用“四人帮”的思想、观点，理解江院长的讲话，攻击江院长的讲话。

在有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上，江院长做过多次讲话，现在归结起来，主要是引导大家弄清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针对当时思想上的混乱，告诫大家对这个问题要慎重，“不要人家一喊就赶”，对资产阶级法权“今天不能改，只能限制”。并且指出没收自留地、没收存牧、取消继承权的作法是错误的。江院长还尖锐地指出：“存牧多了怎么样，你让他取出来买东西，那不扰乱市场吗？他自己的钱又不是偷的，他省吃俭用，把钱存起来，又不剥削别人。”江院长的这些话是符合毛主席关于对资产阶级法权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教导的。但是由于我受“四人帮”的毒太深，特别是国民党特务张春桥的黑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黑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所宣扬的反动谬论，对我影响很深，错误地把生活待遇的差别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混淆了阶级阵线，

混淆了是非。在“四人帮”反动理论的形响下，大字报攻击江院长有关上述讲话是什么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是把资产阶级法权当作命根子。最为恶劣的是还使用什么“剥削”、“偷”、“封子荫孙”等令人难以容忍的字眼，对江院长进行人身攻击。今天我自己再看看这些言语，也自忖惶悚不安。

（紧接下页）

总之，这张大字报的错误是多方面的，涉及到一系列路线是非，上面列举的问题，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仅就这些问题，也足以说明我的错误的严重性质。这张大字报贯彻的是“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它破坏了中央1976年打招呼转弯子会上关于不准层层揪代理人的指示，宣传了大舅的“四人帮”的反动谬论。大字报给江院长罗织罪名，扣上走资派的帽子，甚至把江院长要大家对毛主席指示的学习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搞好经济建设的讲话，歪曲为是搞三项指示为纲。这是一张挥师“四人帮”的大棍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发动进攻的反党大字报。是一张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社会主义制度的三指向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影响了我院当时运动的健康发展，制造了思想混乱，加剧了同志间不团结，给当时院领导人工作造成困难。这里还必须检查，我对错误的认识是相当缓慢的，是经历了一段严重的思想斗争过程，才逐步有所醒悟的。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后的一段时间，我对大字报的错误虽然不是一点触动没有，但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1977年4月14日在院召开的揭批“四人帮”动员大会上，指出了这张大字报的严重性，才使我受到震动，感到沉重。此后在组织和同志们帮助下，虽然在各种形式的会上，几次做了口头的和书面的检查，但在思想深处总认为自己没给“四人帮”一伙送过片纸只字，没有参予“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因而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总是提不高，上不去。经过组织和同志们长时间地耐心地帮助和批判，自己也反复的

认识和思考，我现在才逐步觉悟到，我的错误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受“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说了错话作了错事的问题。我的错误是系统的极为严重的，大字报的全部立场、观点以致语言都是“四人帮”的，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说这张大字报的性质是反党的、是“三指向”的，是因为：第一，在这场严峻的路线斗争中，它是站在“四人帮”的一边，充当“四人帮”的传声机和打手，用“四人帮”的黑货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难，发动了进攻；第二，大字报反对江院长，给江院长扣上走资派，反攻倒算等大帽子，势欲打倒江院长，这就是推行“四人帮”阴谋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老干下的反革命阴谋；第三，大字报全面的系统的宣传“四人帮”的反动谬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字报的观点甚至是超“四人帮”的；第四，大字报在我院抛出、发难，全面地配合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起到了“四人帮”起不到的作用。总之，从这张大字报的严重罪行看，它是反党的，“三指向”的。这里特别说明一下，不是说写大字报就不行，而是我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是反动的，是按“四人帮”调子，向江院长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进攻。

我为什么会接受“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写出这样的一张大字报呢？这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历史、思想根源的。

首先这是因为我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毛主席指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我虽然出身于工人家庭，自幼参加了革命，受党的教育快三十年了，但是我在参加工作前在旧学校上学，从下队转业后，又上了几年大学，虽然知识没学多少，但是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在我身上却是牢固的。平时在工作中和处世待人上表现态（紧接下页）

度生硬，性格孤僻，固执己见，处事别扭，而且由于自以为是，自恃清高，思想偏面，因而长期以来放松了思想改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是死封未动。虽然在组织的关怀下也学习翻了一点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但我并未能完全地、准确地领会精神实质，从中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是满足于只言片语，甚至片言曲解。这就成为我接受“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内因。这也就是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我写出这样一张可以作为我前半生政治鉴定的大字报的思想基础。

另一方面，正如华主席指出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的。”“四人帮”一伙，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欺骗舆论，大搞阴谋活动。他们利用所控制的宣传工具，写黑文章、送黑材料、发表黑讲话，把他们的黑货伪造成所谓“中央精神”，充斥报刊、杂志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册子，用以搅乱人心，左右舆论，散布毒素。而我由于世界观没有转变，便很容易地在一些问题上，错误地或不加分析地接受了“四人帮”的谬论。比如，“四人帮”宣传的什么“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什么“有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什么“党内有资产阶级”等等谬论，对我是产生影响的。而且在粉碎“四人帮”之前，我对这伙黑帮的认识是不清楚的。尽管当时对这些家伙的某些作为不是完全没有想法和议论；但总是错误地把他们当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甚至往往更加错误地认为他们的文章是经毛主席批阅的。在这种认敌为我的情况下，就更加容易接受他们的欺骗，接受他

们的流毒，跟着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跑。革命导师列宁指出：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还说过：“革命者不是那种在革命到来的时候才变得革命的人，而是那种在反动势力最猖獗、自由派和民主派最动摇的时候捍卫革命原则和口号的人。”“四人帮”的欺骗作用，是历史事实。但是就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就出了象龚守芳、庄辛辛以及天安门广场上许许多多反“四人帮”的革命诗词，这些真正的革命者。高法院二百多同志，也没有几个犯有象我这样错误的。而我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通过我的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发生作用，接受它，贯彻它。这说明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世界观如果没有改造，没有转变，就很容易走向邪路。

我犯错误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的资产阶级派性根深蒂固，不能自拔。我对待某些问题往往是从派性出发，用派的观点衡量事物思考问题。我在前边交待写这张大字报过程中谈到了，对江院长讲话的看浅等就是有资产阶级派性的因素。1974年9月至1975年9月我第二次下放湖北干校，当时爱人有病，小孩一周岁，双职工家中无人，经济条件又差，确实困难很大。当组织决定我必须下放后，我思想不通，认为这样安排是派性，给小娃穿，并且对个别同志意见特别大。今天看这是我的主观主义错误的。我没有正确对待这个问题，而由此错误地认为派性的利害还是得争，不然总难免穿小娃。资产阶级

派性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这时我这个世界观没有转变的人，个人主义大大澎涨了。我带着这样的思想，75年秋从干校回机关工作后，便急于了解江院长对高院的运动等情况持什么看法和态度。当我从某个同志那里看到江院长1975年3月底主持的支委学习的全部记录后，这时，我从严重的资产阶级派性出发，从极端的个人主义出发，对江院长有意见有看法。到了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给华主席写了仗，到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后，这时我认为从广播的文件看，邓付主席的事已经变成对抗性的矛盾。对江院长的讲话的看法也就升级。从派性的思想出发，急于向江院长挑战。这样的坏思想，就必然需要用“四人帮”的反动理论和观点来看待江院长的讲话，进行所谓的批判，实际这时我已经步步深入地中了“四人帮”的毒，对“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已步步接受，完全用“四人帮”的谬论衡量江院长的讲话了，我在大字报中自欺欺人的美其名曰是“路线斗争”，实际就是站在“四人帮”一边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斗争。这其中“四人帮”的所谓“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对我的恣意妄为也起了“壮胆的”作用。这就是我资产阶级派性的大澎涨，在“四人帮”加紧向党进攻的时刻，跟着兴风作浪，写出了这张反党大字报的思想脉络。这张大字报既是我执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也是我资产阶级派性发昏到忘乎所以的结果。

我辜负了党对我多年的培养教育，在两条路线斗争的紧要关头，我竟堕落到跟着“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跑，为了个人的私利，倒

施逆行。

今后，我决不能再辜负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教育和期望，从错误中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痛改前非。把沉痛的经验教训，作为后事之师，终生借鉴。我一定从错误的泥坑中爬起来，振作精神，继续革命，认真改造世界观，正确认识自己，坚持“三要三不要”，克服派性，增进团结，严守纪律，在党的十一大路线指引下，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竭尽全力，努力工作。

列宁指出：“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作为改造世界观，纠正错误的一项根本问题，我一定遵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教导，端正学风，完整地、准确地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领会精神实质，从中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克服形而上学，主观片面，坚持事实求是，克服盲目性，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提高觉悟提高识别能力。只有努力这样做，我才能从这次所犯错误中真正吸取教训，在今后继续革命的征途上，减少弯路，防止继续做自欺欺人的政治盲人。

于 连 泽

1978年10月1日

注：此稿在10月6日下午在支部大会做了检查。